

我在美国 读高中

常春藤盟校毕业生传授经验心得
助力中国学生入名校

[美]
矿矿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美国读高中 / (美) 矿矿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7
(大教育书系. 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)
ISBN 978-7-5354-9639-3

I. ①我… II. ①矿… III. ①高中生—学生生活—美国 IV. ①G635.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5249号

责任编辑: 彭姗姗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壹诺

责任印制: 邱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970毫米 1/16 印张: 15.37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66千字

定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搬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王

——《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》序言

全愈兄的教育文集就要出版了。希望我能够写点推荐的文字。其实，他的书是不需要推荐的。黄全愈三个字，就是最好的IP。早在2000年，他的一本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，就轰动了全国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成为当年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。后来，他的系列作品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结集出版，也颇受读者欢迎。

随着他的著作的流行，他的许多教育观点也广为人知。如：“望子成人”比“望子成龙”重要；孩子的兴趣重于父母的兴趣；把失败的权利还给孩子；一流考生绝对不等于一流学生；玩才是素质教育的摇篮，等等。

我和全愈兄是老朋友了，老得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与全愈兄见面的，也记不清是他主动联系我，还是我主动联系他的。只记得当年我还在苏州工作时，我俩在苏州就已经聊起教育颇为投机。

2016年7月，第十六届新教育年会在山东诸城举行，在我们的邀请下，全愈兄万里迢迢从美国赶回参会。在年会上，他作为点评嘉宾，和一线新教育人碰撞出精彩火花；在中美论坛上，他作为主要嘉宾，进行重要发言；在年会中，他单独主持一个分论坛，围绕中美教育异同进行交流……忙得不可开交。可我知道，在那些天里，他一直未能倒过时差，几乎每个白天都身处半梦半醒之间，怎么会精彩地完成这些工作呢？

全愈兄曾经称自己是“土插队，洋插队，打短工，磨洋工，老三届，77级，工农商学兵（如果黑五类的红卫兵也算‘兵’的话）全都沾边”。这不仅说明了他人生经历的丰富性，也反映了他长期置身于中外两种教育背景的独特性。全愈兄的文化之根扎在中国，他的教育之叶长在美国。他

的这套文集，对美国教育进行了全面梳理，从素质教育到家庭教育，从高考到天赋教育，从玩的教育到生存教育，可以说是美国教育的万花筒。但是，他不是简单地介绍美国教育，而是希望通过对美国教育的分析来改造我们的教育，搬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套文集中通过对中美教育进行系统的比较，他既不妄自菲薄，也不故步自封。这种不卑不亢、以我为主、为我所用的研究立场，对培养理性的教育观，有着重要启发。同时，还通过许多典型案例，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，提供了诸多可以拿来就用的好招数。

全愈兄的这套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现身说法。作为在中国出身的美国大学教授，如何教育自己的儿子矿矿？文集中有许多内容记录了他自己和儿子的教育故事。这样一对父子，无论是旧观念与新思想的碰撞，还是中国传统与美国方式的交锋，无一不是趣味和理念的结合，特别值得普通父母们关注和借鉴。

总之，尽管这是一套高品质的教育文集，不仅内容鲜活，而且行文流畅幽默，读来深入浅出，时常让人会心一笑。但这套书并不是供人高高供奉，而是让人随时翻开，瞬间入迷的。

越是远方游子，越是怀念家乡。常年在美国生活，全愈兄减少乡愁的办法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为中国做的事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我经常看到，他通过《中国青年报》等专栏，以及微博等自媒体，隔三岔五搬来一些美国的“石头”，用心地攻中国教育之“玉”。我想，这套文集的再版，就是他坚持攻“玉”的成果。

只是，作者写得再好，还需要读者进行另一半工作，才能真正完成图书的使命。希望更多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书，了解美国，反思中国，搬美国的他山之石，攻中国的教育之玉，就像全愈兄这样。

朱永新

2017年4月26日晨于北京滴石斋

开篇的话

读着过瘾，但晚上难眠

给美国大四学生上课，如果你问这些“老油条”：“对上课，有啥要求？”

许多人会斜着眼睛答曰：“好玩！”

对付研究生，“有料”就差不多能换来崇敬的眼神。美国大四学生最不好应付，既反叛又自大还忒会维权……得“有趣”“有料”才能和谐相处。其实，他们跟着你“好玩”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写作也一样，自己都觉得无聊，不如不写。因此，读者也一定要觉得“好玩”，读起来才有意思。

说得清道理不难，听得懂道理太难……

首先是说得清！让人不懂，太容易，先把自己绕蒙再去蒙人。

上大学时，看过一个电影，总是有着一抹似有似无的淡淡忧伤，而幽默又无处不在。一边咧嘴，一边抹眼泪……

哇，忧幽然，哭笑不得！

我这个人，平日里举轻若重（屁大的事当天大的事）；但写作，我忐忑地想试一试“举重若轻”。

怎样才能把“干货”融进读者的有趣中？怎样才能“润物细无声”地把理论溶解在故事里，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豁然开朗后，又有了莫名的沉重……

2006年，未名湖畔，在“哈哈”声中结束给中小学校长的首场报告。次日，有人说彻夜难眠……找我理论一番。窃喜。

我无力悬壶济世，也不愿做艰深且枯燥的理论说教，更不屑用“心灵鸡汤”代“蒙汗药”；我想把书写得像小说般好看、过瘾，但又在娓娓道来中当头棒喝：“我们是怎样把孩子教傻的”，“可怕的是‘赢在起跑线’的傻跑”……

这里是惶惑的父亲谈孩子的教育，不是教授侃教育理论。

书，一定要读着“好玩”，但光“好玩”会有点弱智，最好夜里又辗转反侧……

这是我惶惶然追求的境界。

然而，答案不在我的书里，在读者心上。

省略就不厚道

原来由各家出版社出单行本，每本书必须叙述完整，但出集子，有些书之间可能会有点儿重复。例如，在分析中国素质教育的盲区时，我在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里，引用了“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交叉图解”；在阐述怎么样在“玩”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时，我在《素质教育在美国3：玩的教育》里，解释了“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”的理论。某些重复的部分，要不要删？

当然，最简单的办法是所有的读者都买整套书，我们重新编辑、整理全套书的内容后，把重复的部分删掉。但考虑到许多读者可能不买整套书，而是根据各自的需要买单行本，如果删了有关内容，买单行本的读者就会不知所云。为了叙述的完整及单行本的独立性，也为了阅读的方便，似乎不删更妥些。

我曾想过删除某些重复的部分后注明：请参阅某某书的某某章！妻子摇头：“不厚道！为了一两段文字，逼着读者买另外一本书。”也是哦，厚道有时也会不厚道！

于是，只要不影响行文，能删的就删；不便删的……“真理”嘛，重复一千遍也还是真理！

若干年前针砭时弊，可谓入木三分，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有点隔靴搔痒，如专业对口、包分配、5%的自主招生等。

我说：还是还原历史的真实吧。鲁迅的著作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值得质疑的语法问题，如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中的“总之，落水狗的是否该打”等。

妻子打断我的话：“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，看来还可能真是问题……”
结果，就是适当删改。并不是我想藏拙，敬请读者原谅。

“素质教育”的来龙去脉（代总序）

都是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惹的“祸”

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在博客中说，他们曾为怎么译“素质教育”颇伤脑筋。其同事张妮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，她的一位教授在中美教育研究中有特殊地位，也为中国教育部的教育改革提供咨询。他的特殊价值是对中国教育的各种词汇的精准翻译，使得美国人能理解那些中国独有的教育词汇，进而理解中国教育。然而，这位教授不知何为“素质教育”，试图把“素质教育”译为“quality education for general public”。这个翻译显然不得要领！徐小平说：“我实在无法理解‘素质教育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、家长、学生都曾饶有兴味地问过美国人“素质教育”问题。美国人均一头雾水！这样一来，更惊惑不解的变成国人：美国不是在实施素质教育吗？为何竟然不知素质教育为何物？

恐怕，这都是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惹的“祸”。

2010年某日，秘书通知：校长办公室电话，一中国教育局长下午来访……

教育局长，一般访客。我们是州立大学，惊动校长，一定与州里有关。果然，是“友好省（湖北）教育代表团”成员，由当地学区督导（相当于国内教育局长）陪同。

国内访客，要么盲目自大（以为中国基础教育世界第一），要么有点不自信。此客人不卑不亢，不怎么说话……突然问一句：“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？”

我一愣，哈哈大笑：“严格地说，美国不用‘素质教育’这个词……”

他打断我：“您说美国没有‘素质教育’？”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。

我说：“这个话题非常有趣！美国有我们所说的‘素质教育’，但不用这个名字。如果你跟美国人提‘素质教育’这个概念，有人也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，但许多人可能不知所云。不信，你试问这位学区督导……”

他看看学区督导，给我摊开从公文包里掏出的几张中文报纸：“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？”

我一看，乐了！这不是2000年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《冰点》（专栏）上发的几个整版文章吗？

同事指着报纸上的照片：“看看，这人是谁？”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照片……突然眼睛微微泛光！

我点点头：“岁月是把杀猪刀。”

“素质教育”曾是有名无实的概念。

有人评价：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反对者：绝对言过其实！

支持者：没有黄全愈的系列丛书，国人恐怕根本不理解素质教育为何物！

我：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……

据说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，就有了“素质教育”的提法。但何为“素质教育”？国人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；除了概念还是概念，谁也说不清、道不明。有人说，当时“素质教育”留在人们（包括教育者）脑海

里——仅此四个字眼而已，其余都还滞留在文件的字里行间。2000年，在央视做节目时，北京四中刘长铭副校长跟我说：关于素质教育，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。2001年，台州师范的张教授告诉我：关于素质教育，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。

何为素质教育？

有人以为：课后唱唱歌、跳跳舞就是素质教育。

还有教育学院的院长、中小学校长跟我辩论：应试是不是素质？当然，应试教育就是素质教育！

让人啼笑皆非。

鉴于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及改革教育之需要，有人（至于谁，至今是悬案！孙云晓在博客里说，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曾以为是柳斌提出的，但柳先生否认）提出一个与“应试教育”相对应的概念“素质教育”。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？如何实践“素质教育”？还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：“摸着石头过河。”

我也“摸着石头”漂洋过海——到美国攻读博士，研究教育理论。

后来，我集近二十年的观察、比较、研究、分析，写了本书《跨文化之教育远足》，内容正是颠覆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，为教育的真谛正名——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所谓“素质教育”；于是，我“洋为中用”地给这本书取了个中国名字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。

从此，有名无实的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、生动、可操作、可实施、活灵活现、神形兼备的实质：激发创新、解放个性、尊重人性、鼓励独立、勇于质疑、敢于求异、善于发现、促发科研、学以致用、植根社会、孕育领导、强健体魄……

当时，有人把书送给有关领导。据送书的人说，某部长签了俩字：收到。柳斌先生四个字：颇有启发！

据编辑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《冰点》（专栏）发到第二篇《孩子能

不能搞研究》（前一篇《创造性能不能教》，后一篇《孩子毕竟是孩子吗》），教育部一副部长来电话，要了20份报纸。

关于“孩子能不能搞研究”的问题，国人争论不休。华中科技大学一教授义正词严地坚称：没夯实厚重的基础前，绝不能搞研究……然而，把汉语的“研究生”（大学本科毕业后，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深造，做研究的学生）意译成英文，美国师生均不知所云：为什么非要等大学毕业后，才能做研究？

那年，人们仍跟我争辩：应试教育好！

我说：考试仅为检测教学的手段之一，但当这个之一的“手段”变成整个教育为之团团转的唯一“目的”，教育的本质是否已被颠倒？

沉默俄顷，听众又群情激奋……

我只好说：建议计生委允许生二胎，一个搞应试教育，一个搞素质教育。20年后，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……

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。

次年，对素质教育人们已将信将疑，逐步消化……基本无人再质疑其真谛。

其实，美国人基本不用“素质教育”这个称谓，是我“张冠李戴”的。也有人说，素质教育从“有名无实”到“名副其实”，是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贡献。

最近，有人质疑：素质教育没有哲学基础。

国人喜欢名正言顺，啥事都要有个“理”。

若问国人：米卢有无理论？恐怕均大摇其头。米卢的训练，就像美国中小学课堂那样小儿科，毫无章法。13亿人看不清米卢的道道，连他的助手和队员也一头雾水，以为他只会玩、闹，沽名钓誉而已。可悲呀，自“骗子”离去，中国与世界杯越来越远。闹不清怎么输，可怜！弄不明怎么赢，可笑更可悲！

前人曾说：愚钝者对已成功的事还看不明白，睿智者事情还没露苗头已看到结果。不能跟俗人商量创始，只能与他们庆贺成功。

我不敢揣度，米卢从中国既狼狈而去又满载而归时，是否亦此心态？

我也曾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没基础，但钻进去二十多年，越研究越深不见底。其实，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即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。

有趣的是，虽然美国不用“素质教育”这个称谓，但如只给“素质”“教育”这两个单词，不少美国人也能像山寨版“杜威”一样，将教育的本质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……

素质教育的尴尬

有人说，我那本关于“素质教育”的书能成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，是“时势造英雄”；其实是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，是探索出路的教育改革在强烈地呼唤素质教育。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出版时，素质教育已在中国提倡了近二十年，但争来论去，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，漫说普罗大众，就是引领教育的厅长、局长、校长们也难说出子丑寅卯。一教育厅长跟我说：“现在提倡素质教育，但忒搞笑的是，反对者在为反对而反对，因为根本找不到着力点；推介者有劲无处使，也是找不到着力点。因为它就是个空洞的口号，没理论、无内容。而你的书正好在这个时候，很直观、生动、理性、深刻、系统地回答了国人的种种困惑……”

写作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时，我有两个“设计”：一是以父亲的视角来写素质教育，以便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，使“素质教育”更具亲和力及溶解度。由于我同时又研究教育理论，把理论和多年的困惑和思考糅在一起，再“悄悄地”融入日常的观察和教育实例中，以期“举重若轻”，“润物细无声”地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产生震撼的效果。二是以教师为

主要读者群。这两个“设计”，产生了一个“意外”：家长冒了出来！我无法统计读者中到底家长多还是老师多，但家长的热情似比老师高，至少未发现对拙作咬牙切齿的家长，然而有公开扬言要“砍”我的老师，并且是在南宁——我的故乡。我对转达这个“砍”的老师淡淡一笑：姑且看作君子动口不动手的“侃”吧，不然就真没“素质”了。

接着，我为热情的家长写了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5：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》，以一问一答的形式，解答读者林林总总、五花八门的关于“素质教育”的问题……

教育部第 49 道“减负令”如同武侠小说描述的“巨大冲击力消失于无形”——家长不受管，自行加负！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3：玩的教育》把“玩”提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！许多读者说：从未意识到“玩”也是一种教育，而且是素质教育……

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7：放开孩子的手》出版后，许多读者说：原来“生存教育”几乎可以理解为“素质教育”！难怪说杜威的“教育就是生活”是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。可是，哼哼也好，唧唧也罢，我们挣扎于：没有成绩，过不了今天；只有成绩，过不了明天。在应试教育中生存，还是着眼于未来的社会竞争？当顾头不顾尾的鸵鸟，还是做翱翔于蓝天的雄鹰……

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4：智慧孩子是怎么炼成的》出版后，许多读者说：哎呀！天赋教育就是素质教育！但高考把孩子的天赋扼杀得只剩考试能力了……

许多读者在书店拿着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6：你也能够上哈佛》翻来翻去，犹豫再三最后又放下了，他们说：看了半天，美国“高考”就是给接受素质教育的“学生”开绿灯，对应试教育的“考生”亮红灯，红灯都亮了，书也别买了……

这些“素质教育”系列丛书，从“创造性能不能教”到“孩子需要

领导素质吗”；从“批判性阅读”到“学习性研究”；从“能不能用左手写字”到“解决问题重要还是发现问题重要”；从“玩，是孩子对世界最大的贡献”到“玩具，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”；从“在同龄人中学会生存”到“家长参加‘童子军’”；从“三合一（高考+高中成绩+综合素质）录取标准”到“多元文化校园的核裂变”……既涵盖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等方面的内涵，也外延了“素质教育”的跟踪步履。

2003年12月，潍坊一高中校长在报告会上宣称：“您的素质教育理念已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！”

全场静悄悄……

我有点忐忑。

现在，已无人再跟我争辩“素质教育”的问题，国人已坦然，甚至欣然接受了“素质教育”。

但高考这个“瓶颈”卡住了素质教育。

《光明日报》2006年11月5日的长篇报道《黄全愈：教育的“修桶匠”》写道：“……在北京地坛公园书市，《你也能够上哈佛》仅售出寥寥数本。散场时，散落在地上的宣传材料随风飞舞，一派萧索。”

不迈过高考这道坎，素质教育与中国渐行渐远……

再来个20年，还是素质教育

我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说是早在1998年前，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、大学二把手马林科维奇博士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：亚洲大学（特别提及中国）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。

十多年后，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“中外大学校长论坛”上，斯坦福大

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：“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。”

斯坦福大学的领导们是否患数字“失忆症”？十多年过去了，还说再需要“20年”。更恐怖的是，他还说：慢则50年……

又是一本算了几个“20年”都算不清的糊涂账！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中美两国派教育考察团互访，双方都曾做出同样的预言：“再经过20年的教育，中国的科技将远远把美国甩在后面！”预言的对错，暂且不论。十分有趣的是：这里说的也是20年！

中国人说“三岁看老”“百年树人”，显然是夸张的文学描述。作为科学论述，为什么斯坦福前后两位领导都以“20年”说事？若然不是信口开河，这“20年”的依据从何而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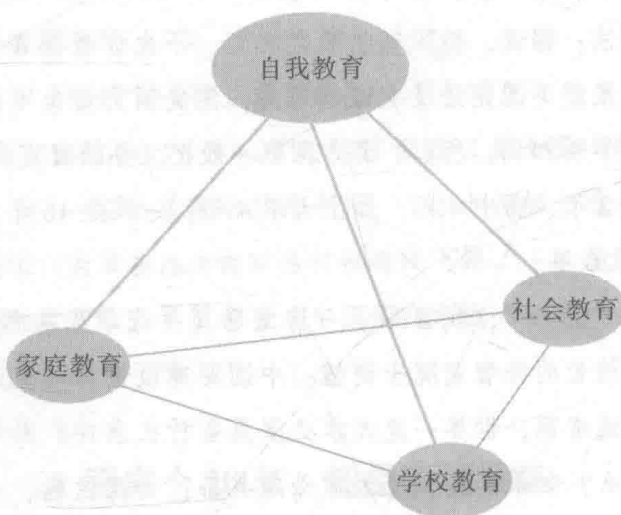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有两种算法：第一种，学前3—4年，再加上小学6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3年、大学4年，共约20年。

另一种算法：据说，德国宪法明文规定，不允许教授6岁前的孩子任何学科知识。虽然美国宪法没有这个规定，但美国文化也不提倡6岁前的孩子学习任何学科知识。所以，西方国家一般把义务教育定为12年，即小学6年、初中2年、高中4年，加上大学4年，一共是16年，再加上研究生教育，大致20年。

因为这个“20年”，我曾写了一篇文章《一流学生从哪里来》，主旨是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院士商榷：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或者说，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什么条件？而中国最难实现的条件又是什么？如果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：一流设施、一流管理、一流师资、一流学生，那么，中国最大的困难是“一流学生”。因为中国可以通过举国体制在财力上向北大清华倾斜若干年，并进行世界范围的“重奖之下出勇夫”的人才招揽，完全可能在十年，甚至更短时间内，实现前三个“一流”。至于“一流学生”，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，从K-12（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）就开始扎扎实实地推行素质教育，否则北大清华不可能

获得一流生源。没有一流生源，北大清华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根本不可能在4年内培养出一流大学生，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研究生。换言之，一栋楼能建多高，取决于基础有多牢固，而不是屋顶有多尖。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，这个基础“搬”不来，必须自己已经年累月地去夯实、去奠定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：既然举国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“前三个一流”，如果我们也用举国体制在100所高中里专门为北大清华培养生源，北大清华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生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，高中生的成长模式已基本定型，此时才开始实施素质教育，已鞭长莫及，难以大器晚成。那么，不选高中，而选K-12的100所完小和完中呢？让我们来分析我的“三脚架理论”：



我认为，教育是四位一体的，包括了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自我教育。首先是“三点成一面”；然后，在这个面上凸显一个“点”：类似照相机的“三脚架”。因此，我把它叫作“三脚架理论”。

既然是“四位一体”，许多时候“四位”难以截然分开，形成你中有